



# 坚守初心的张波平

■张晓晖

黑漆漆的夜,如豆的灯光映照在一位贤淑少妇写满了忧郁的脸庞上。她叫贾好莲,出生于万泉县北张户村一大家人家,嫁给了西解村的青年才俊张波平。结婚没有多长时间,丈夫就失踪了,留下牙牙学语的孩子、年迈的双亲,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,一个年轻的女人是多么不容易。13年的时间,丈夫杳无音讯。漫长的岁月,漫长的等待,日子总是望不到尽头。每当别人劝她改嫁时,她总是紧抿着双唇,轻轻地摇摇头,她丢不下年幼的孩子,丢不下渐已衰老的公婆。

每当想起丈夫张波平,她心中充满了回忆,充满了甜蜜。张波平一米八几的个子,戴着一副眼镜,斯斯文文,一副书生的模样。他从万泉五高和简易师范毕业后,先在附近村庄教学。当时日寇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,侵略的魔爪也伸到了万泉县,每个正直的中国人拼尽了全力与日寇抗争,张波平也不例外。他积极参加抗日组织,于1938年10月奔赴延安抗大学习,并于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学习期满后,他返回山西,在稷王山下的十里文村进行抗日活动,此地离他的家乡西解村只有区区30里地,但他13年都没有回过家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,他思念着娇妻幼子,思念着年迈的双亲,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

张波平自幼在芦邑村长大,十五六岁时,因为舅舅没有男孩,他来到了西解村,过继给舅舅做了儿子。他离家参加革命时,并没有对家人说起,但狡猾的敌人总是对他有所怀疑。日寇把张波平芦邑的父亲拉到伪万泉县政府毒打,逼问张波平下落,还戳了父亲一刀。解店编村村长刘洪德率人冲入张波平芦邑的家,还让手下人殴打他的二哥。家仇国恨,紧于心间,无不定誓着张波平与敌斗争的决心。

万泉、荣河解放后,张波平担任了荣河县委副书记、代理书记。1954年,万泉、荣河合并后,他又担任了万荣县第一副书记、代理书记、第二书记,后来又担任副书记。面对职务上的调整,他毫无怨言,一心想着工作,从不考虑自己的职位和升迁,体现了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。

张波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,甚至到了

苛刻的地步。长子学礼结婚,亲戚朋友都来参加,唯独不见他这个主婚人,他照常去上他的班。而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飞云楼下,离西解村只有二里地,骑自行车只十分钟的样子,就这他都顾不上参加,到下班才回来。他的三子建河结婚时,他也没参加。他想熬上一锅烩菜,让亲戚朋友们吃一顿就行了。他妻子认为,孩子结婚是人生大事,咱们只是和别人一样,摆上几个盘子就行,就这,他都不同意。因为他没有参加,亲家为此很生气,认为他有架子、看不起人。

有关群众利益的事,再小也是大事。新城村陈启贵,曾是一名副营长,在横渡长江战役中牺牲,一直被列为失踪人员,对家属没有个说法。担任驻外大使馆武官的陈皓,是陈启贵的上级,他给张波平写信,告之以详情。张波平让民政局马上调查此事,把陈启贵评为烈士,颁发了烈士证书。1958年,万荣县兴修跃进水库,工程还未竣工,突降暴雨,他和县领导王国英昼夜巡逻在大坝上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大坝决口后,面对汹涌的洪水,他没有丝毫的犹豫,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,带头跳到水中,同群众一道用麻袋堵决口。

张波平原则性极强,廉洁奉公,一尘不染。他干革命时,年轻的妻子带着孩子在家,岳父母给家里帮衬不少。土改时,岳父家里的经济情况尚可,村里的农会干部问张波平,成分如何划分?当时他负责万泉县北片的土改工作,就包括岳父所在的北张户村。他回答说,按政策办,该咋办就咋办。岳家划为上中农。以后有人告状,说他给岳父家走后门,划的成分偏轻,工资还降了一级,后经过上级调查,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,他又被平了反。

《万荣县志》介绍张波平:为官清正,廉洁自律,吃苦耐劳,公私分明,绝不贪占国家半点便宜。1976年,他在老家修建房屋,运城地区建筑公司其他领导闻讯后,即派司机送来檩条和椽材,当时他正四处寻找木材,这正是雪中送炭,不想他见状大发雷霆,一再追问司机谁派他送来。司机知道他的性格,按照公司领导的嘱咐,默不作声,他让司机立即拉回。在场的亲友把他劝回,并请司机进屋吃饭,还将木料暗暗卸下。他送司机出来时,发现车空

了,大为恼火,责备亲友“陷自己于不义”,并命亲友和司机将木料装上拉走。

张波平担任过县委书记,以后又长期在教育部担任领导职务,是13级干部。但他生活节俭,吃饭时有咸菜、窝窝头就行,吃酸菜不用油,就撒点辣椒面。他为人低调,对人和蔼,没有架子,深得群众好评,后调入地区建筑公司后,经常深入工地检查工作,同工人一道吃饭,不搞任何特殊化。

真正的共产党人,不仅要有崇高的理想、优良的作风,还要有忍辱负重、勇于牺牲的品质。“文革”中,他虽遭受了冲击,却照样不改初衷,坚持工作。“文革”后期,他担任着山西师范学院书记,返回宿舍后,发现床上被子裹着一包炸药,他知道,这是造反派送的“见面礼”,就叫来解放军处理了炸药包,接着又投入到工作中去。我曾见过他那时的半身照片,脸庞消瘦、头发花白、面容憔悴,看上去就像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,而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。

凡是给群众做了好事的人,大家都不会忘记。那时,张波平受冲击回到西解村,村里的干部群众把他送到孤山国营林场隐藏起来。张波平去世后,西解村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义务为他打墓,乡亲们神情凝重,佩戴白花为他送行。

翻看中共万荣党史,张波平是一位永远绕不开的人物,他担任荣河和万荣县委副书记,是山西省第一届和第二届人大代表。时间过去几十年了,接触过他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,但提起他,人们都很尊敬,总是称呼他为张书记,人们都还能回忆起他所做的诸多好事,回忆起他生前所做的点点滴滴。在他身上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,但一件件、一桩桩的平凡事情,坚持做好也很不容易。这些小事无不体现着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格局和情怀,无不体现着一位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。张波平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他用自己执着的信仰和为民的情怀、牺牲的精神,给我们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“波澜壮阔,浩气一身,为民执政千秋颂;平易近人,清风两袖,立党无私万代芳。”他的下属庞敬一写的一副挽联道出了大家的心声。

些水费,同时将浇地人的费用适当减免一部分,这样才使矛盾纠纷得以缓解。邻近村子一些心眼活泛的人,由此看到了“商机”,大做“水”文章。他们开着三轮手扶、四轮拖拉机,车上装载着自己焊制的大水桶,走村串巷卖水,据说生意还不错。

那时候,村子里的村民,无论谁家修厦盖房过红白喜事,盖房之务当是和卖水人联系妥帖。修厦盖房,好事一般还好说,准备时间较长,手不忙脚也不乱。而白事就不好说了,尤其是车祸、心梗等猝逝、病死者,由于事发突然,亲人应付不及,往往可以看到一边是撕心裂肺号啕大哭,一边又面对着满屋满院前来帮忙的乡邻们,嘶哑着嗓子赶快差人联系吃水事宜。

母亲身体常年有病,所以每次探亲离家时,我总要想办法把大、小水瓮等盛水器装满后才走。

进入本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,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,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吃不饱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变。但随着北方天气日益干旱,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,井口愈来愈密,水井越打越深,生态环境日益恶劣,人们吃水又成了大问题。每到夏季干旱时,家家户户都要请来几个亲朋好友淘井。水井由刚开始的三四米,到后来的七八米,甚至一二十米……年年淘井,井里却常常没水。更何况,那直径只有两三米左右的井筒,致使人们淘井异常困难,井底缺氧以及用轱辘绞着上出泥时的安全隐患更是个大问题。一年夏天,时年二十出头的四弟在给堂弟家淘井时,井口的一块砖不慎松动掉进井里,砸在他的头上。十分庆幸的是,当时他头上戴着一顶“柳条帽”,人没有受到伤害,只是虚惊一场。当然也有好办法,就是请县井队用“大锅锥”打井,可以打三四十米或者更深一点,水源能够得到保证。但“大锅锥”打井,一是费用偏高,绝大多数村民打不起井;二是县井队“大锅锥”的数量有限,要想打井往往要排队等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日常吃水靠机井浇地时,手提肩挑,或用自行车托运,或用小平车拉运水,虽然十分不便,但总算还能吃上水。承包村机井的村民,面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,初时忍之放之,大家随意取水,但久而久之,取水的人多了,难免就会影响庄稼正常灌溉。在这种情况下,浇地的村民难免会嫌水量小有意见,时常会与取水人发生口角,甚至打架斗殴,严重影响农村的安定团结。对此,村委会以“村规民约”形式明确规定:由承包机井者,依据村民取水水量大小,适当收取一

## 文人走笔

# 村曲

■杨昱让

同事芳林说他在我的老家认领了一棵梨树,今天开园,硬要拉着我一起去。我们又绕道村里,叫上了我的发小生龙,他和芳林是初中同学。

原以为梨树在林山村,谁知道在古城村(现在叫万泉村)。我们正打听村委会的地址,就碰到了要找的人——驻万泉村第一书记李锡堂。他开着一辆三轮车,说这就是他们驻村干部的专车。他在前边带路,我们紧随其后。出北门没走多远,车在去县城的公路旁停了下来。梨园到了!

地头已经站满了人,大家欢天喜地等待着开园。我站在地头看着竖着的牌子,上边是梨园介绍,园主是贾哲贵。我觉得这个名字怪熟悉,纳闷着,就听见生龙叫我,他正站在贾哲贵面前说话。我走到跟前,一眼便认出他是我在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。

记得贾哲贵在学校长得比我还瘦小,现在的个子也不高,但是胖了好多。在学校时,他穿得最破烂,总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塌沿蓝帽子,遮住他那乱糟糟的头发。头小帽大,时不时溜下来挡住视线,他只好把帽子歪着戴。我去过他家,他从小没有妈,我也没见过他爸,跟个孤儿一样。

贾哲贵儿时家就穷,没想到现在还是贫困。他是因病致贫。

前些年,贾哲贵和老伴在街上摆了个油糕摊,老两口儿起早贪黑地卖油糕,也积攒下了十几万元。不料,抱养的女儿得了重病,花光了他们的积蓄,最后女儿还是走了,贾哲贵又成了贫困户。

像贾哲贵这样无儿无女的老人,原本可以进敬老院,但他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,他和老伴辛辛苦苦地管理梨园,一年到头收不了几个钱,生活困苦。驻村第一书记李锡堂与贾哲贵结为了帮扶对象,李锡堂脑瓜机灵、点子多,想出了一个帮扶办法:认领“爱心树”。今年梨花盛开时,李锡堂为贾哲贵策划了一个梨花节,梨花节上来了许多爱心人士,他们踊跃认领“爱心树”。

认领“爱心树”这天,老白的梨园悬挂一排红灯笼,两旁各有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,十分喜庆。

开园了,人们蜂拥进梨园,寻找各自的“爱心树”。刚好又是星期天,好些人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,一群孩子提着篮子在梨园里跑来跑去,清脆的笑声像小鸟叫一样欢快。

我和生龙看着梨园里忙碌采摘的人们,目光不约而同地停留在那金灿灿的梨子上。

生龙说:“咱们这儿的酥梨是从外地引进的,种到咱这儿反而比原产地的梨还好吃得多,因为咱们这儿的气候、地理条件特别适宜种植梨树,日照长、温差大、成熟晚、糖分高,梨当然好吃了。”我说:“我还是喜欢吃咱们的孤山金梨,酸甜可口。”生龙说,孤山金梨吃不上了,一棵树也没有了。我问为什么?生龙说:“金梨皮厚、渣多、个头太大,现在人讲究梨不能分着吃,金梨一个就要一二斤重,谁吃得了?”

但我就是怀念孤山金梨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

## 往事如烟

# 大山里的麦收

■胡春良

布谷鸟在家乡大山里被称作“谷谷鸟”或“姑姑鸟”。人们把它的叫声解读为“姑姑、裤裤”。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,话说中条山的山沟里有户人家,一家三口,倒也平实快乐。想不到的是在小男孩五岁的时候,他妈妈得病走了,剩下他和爸爸相依为命。庆幸的是,这孩子有一位热心的姑姑,嫁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,经常来看侄子。说来也巧,恰好有一位逃难的妇女带了个小男孩流落到这里。在好心人的张罗下,这妇女和那家的男人走到一起,这下成了一家四口。这妇女带来的男孩比这家的男孩小一岁,这女人经常苛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,背着丈夫,对他不是打就是骂。

有一年年景好,收成不错,男主人专门去城里为一家人扯下新布料,置买新棉花,打算过个新新的年。让人不解的是,穿上同样的新棉花的小哥俩,哥哥经常喊饿。有一天,父亲让哥哥帮忙砍水,他瑟瑟发抖,似乎不情愿,生气的父亲一鞭子下去,孩子的棉裤裂了个口子,里面居然是山棉花絮,而不是新棉花。那山棉花絮根本不御寒。目瞪口呆的父亲终于明白了,但是孩子却得了病,最后死在姑姑的怀抱里。据说,这孩子变成了一只鸟,不停地叫着“姑姑、裤裤”,他是祈求姑姑能给他做一件温暖的棉裤呀。

小时候,经常听爷爷奶奶以及村里的老人们讲这个故事,所以觉得这鸟叫声令人不舒服、不开心。不舒服也罢,不开心也罢,布谷鸟叫得最欢的时候,山乡的麦子也就熟了。而此时,山间杏树上的杏子也红了,特别是向阳的那一面,更是像涂了胭脂一样,红得可爱。每当这个时候,奶奶总会说:“杏红麦黄,绣女下床。”意思是所有的人都要投入“龙口夺食”的麦收了。

山里的麦子熟得晚,一般到阳历6月15日以后才熟,这时雨季也就快到了,所以人们称麦收为“龙口夺食”,意味着一定要和龙王比速度,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把麦子收割完。所以收麦子的气氛极为紧张。关于麦收,记忆最深的那一届,更是像涂了胭脂一样,红得可爱。每当这个时候,奶奶总会说:“杏红麦黄,绣女下床。”意思是所有的人都要投入“龙口夺食”的麦收了。

在生产队收麦时,大人忙,小孩也不会闲着。那时有麦假,小孩的主要任务是拾麦。把散落在地里的麦子拾起来,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,然后背到打麦场。村里有专人过秤登记,谁拾的麦穗多,就会受到表扬,还会反馈到学校。有一个小伙伴比较精明,专挑穗大的拾,他的分量总是多。而我呢,实心眼,只要是遗落的麦子都捡,不想有丝毫浪费。尽管我捡的麦捆总是小,但分量上总是差点。我捡过的麦地一般很难再捡下,干净着呢。有一次,一个小

和同事去孤山看梨花,那梨树都生长在堰边地头,甚至悬崖峭壁上,都是几十年、上百年的树,那树高大如巨伞,满树繁花盛开如粉妆玉雕。车行山中,一个急转弯,一树梨花向车头压来,让人惊喜连连。途经林山村,村民用水桶提来黄灿灿的大金梨招待我们,我们就站在梨花盛开的树下,双手捧着一颗大金梨,吃得满嘴汁液流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仍然忘不了孤山金梨那酸甜的味道,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品尝金梨了。

那天从山上下来,我们专门去了乡政府,见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崔惠民,我向他建议学习外地经验,以花为媒,办梨花会。崔惠民书记采纳了我的意见,第二年果然举办了首届万荣孤山梨花节。梨花节共办了多少届我不知道,但现在肯定不办了——没有了梨树、没有了梨花,也没有了梨花节。

梨大也有过?谁说梨不能分着吃?小时候漫长的冬夜,我们姊妹几个围坐在热烘烘的土炕上,听父亲讲《三国演义》,父亲讲到口渴或者高兴时,便会起身从板箱里摸出一颗孤山金梨。父亲用一把铁匠打制的水果刀将梨一牙牙切开,递到我们的小手上,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吃着那薄薄的梨片,只觉得那就是天底下最美味的水果了。

梨不能分着吃?哪来的那么多讲究!

见我愤愤不平的样子,生龙笑了,他说,林山人靠着孤山金梨富裕过,你还记得挣工分的年代,咱们山下一个劳动日分两毛钱,林山大队一个劳动日是两块钱吗?凭什么?还不是因为有梨嘛。分到户后,林山人还风光了几年。然而好景不长,出现了新品种酥梨,孤山金梨慢慢无人问津了。窝里堆满了梨,就是卖不出去,他们能怎么办?两年时间,山上的梨树砍伐一空。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梨树,砍伐时林山人能不心痛?现在咱们吃苹果只知道红富士,谁还记得国光苹果?年轻点的恐怕都没听过这个名字了。

我哑然无语了。物竞天择,优胜劣汰,我们无可奈何。

现在引进的酥梨,树身不高也不大,便于管理;果实也小,每个几两重,颇受消费者的喜爱。

爱心人士采摘一箱箱酥梨,老贾的老伴开着三轮车帮他们运到地头。孩子们雀跃不已,显得格外兴奋,这里也有他们的劳动成果。老贾在地头过秤,每斤2元钱。大家兴高采烈地慷慨解囊,还不让老贾找钱——爱心人士奉献的就是一颗颗爱心;还有爱心人士把这饱含着爱心的酥梨直接送往敬老院,让爱心继续延伸。

老贾黑红的脸庞流淌着汗水和泪水,他收下爱心人士的钱,报以感恩的微笑。

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……”

这也许只是精准扶贫、脱贫致富、乡村振兴,奔向小康大合唱中一个小小的插曲,这插曲虽然微小,却是那么动听、那么动人。

# 生命之源

■张兴平

适逢盛世精神爽,吃水难忘打井人。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,作为一名具有35年党龄的退休人员,我再次想起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水的故事。

有道是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少儿时代的我,就已初识水性。

我家住在中条山下、伍姓湖畔。全长200公里、流域面积5548多万平方公里的涑水河,将运城盆地8个县(市、区)的一部分水汇集起来,流到我们村子西北,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淡水湖——伍姓湖。数万公顷的湖面碧波荡漾、鱼翔浅底,鸟儿翩跹、风景优美。记得小时候,一年夏季发大水,我们村北的庄稼地里都成了鱼虾的乐园,尺许长的大鱼摇头摆尾,在棉花、玉米地里游来荡去,引得我们不少小伙伴放学后都去地里逮鱼捕虾。刚开始时,由于既无经验又无工具,只是用手抓,大家好不容易围住一尾鱼,但抓的时候,鱼却“刺溜”一下就跑掉了。我们围追堵截,东奔西跑,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在庄稼地里,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水。

那时,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水井,水位很浅,只有三四米的样子。我家的院基比较大,有六七分地,房屋空处被父母开垦成菜园,种点桃、杏、苹果及菠菜、韭菜、大葱之类。夏日放学后,我常常拿一只小柳罐,用轱辘从井里汲水浇园,既帮大人干点活,减轻家里经济负担,又使满院姹紫嫣红、生机无限。

时值以生产队为基础单位的年代,地里的庄稼浇灌,往往是靠手提肩挑完成。经济条件稍好的生产队,一般是用装有链条的水车汲水,动力是人力、牲畜或电力。但当时电力紧张,再加上三伏天气里流淌着火星子,庄稼晒得蔫不唧唧,急需浇灌时,晚上水车却热腾腾地帮倒忙,链条时不时被卡断,生产队队长就急忙忙地提着马灯回村喊人,组织社员们打捞链条,既费时又误工。有时打捞链条的社员忙中出乱,一步踩空的话,还会掉进井里的风险,急得大家只好手忙脚乱地先把